

二里头遗址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个距今3800年—3500年的古文明究竟拥有怎样的王朝气象？请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在《中国考古大讲堂》第五季“探源·寻根”讲座中，告诉我们一个礼乐初成、奠基三代的“二里头王朝”。

赵海涛 “考古寻夏第一人”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地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交界处，属于广义的中原地区。广义的中原地区包括河南、陕西、山西等省，该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无论从气候、地貌还是交通、物产等各方面来说都非常适宜建都。所以，中国古代的绝大多数王朝都在中原地区建都。

二里头遗址是著名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专门调查“夏墟”而发现的。徐旭生先生被誉为“考古寻夏第一人”，通过研究，他认为豫西和晋南是最有可能发现“夏墟”的地方。1959年4月，已经71岁高龄的他从北京出发，前往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以及晋南地区一路调查，发现了20余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二里头遗址。当年秋天，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时至今日，60多年过去了，几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数十次考古发掘，总共发掘了6万多平方米的面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1977年，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成果将二里头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视觉中国 供图

这座都城遗址藏着“中国”起源的秘密



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

近年，在二里头遗址北侧约1.3公里的古城村遗址，我们发现了大型的壕沟，还有绵延数公里的夯土墙。更重要的是，这些壕沟和夯土墙不仅与二里头遗址的主干道路、墙垣、夯土建筑等主体遗存方向一致、时代相同，而且它们对二里头遗址形成了一个合围之势。因此我们推测，它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的外围壕沟和城墙。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原来的二里头遗址只能算是二里头都城的中心区，这将大幅扩大二里头都邑的实际规模。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处于龙山文化和二里头岗期文化之间，从历史属性上来说，正是处在邦国时代到王国时代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龙山文化末期（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800年），属于前王朝时代；在二里头文化之后的年代则是商前期。

通过60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我们确定，二里头文化是在中原地区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诞生的。中原地区从大约距今10000年开始，其文化发展史谱系非常清晰，是连续发展的。从陶器来看，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器有很强的连续性。从农业、手工业的各种遗存来看，二里头文化与龙山文化也有很强的传承发展关系。特别是从筑城技术上来看，二里头遗址大型夯土建筑的布局 and 结构都继承了龙山文化的一些因素。

二里头遗址因处于中原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吸收了来自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先进文化因素。比如，来自西北的绵羊、山羊、大麦、小麦，来自南方的肖家屋脊遗址的玉器，来自东方的礼器，来自北方的环首刀、花边碗，甚至还有来自热带海洋地区的海贝等。二里头文化正是将这些先进文化因素加以整合和创新，创造出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具有王权气象的成就，包括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络、最早的双轮车、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国家祭祀场和祭祀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最早的绿松石器加工作坊等。

由此，二里头遗址成为迄今为止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它使中国历史由多元化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体化的王国时代，奠定了古代“中国”的基础。

礼乐文明的创建

二里头文化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它对礼乐文明的创建上。礼是人與人、人与自然(神)之间交往行为的规范与准则。礼制则是权力机构颁布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神)、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交往的规范与准则。礼乐制度是早期华夏文明的核心、特色和精髓内容，礼乐制度的核

二里头王国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是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根、灵魂和奠基者。——赵海涛

心是等级制度。礼以“明贵贱、辨等列”，乐以融合、统一、教化，礼乐制度共同来确定上下、尊卑关系，体现贵族的特权和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

具体到二里头文化来说，从都城选址、布局规划、宫城官室建筑、祭祀遗存、墓葬，到青铜、玉、绿松石等礼器，再到聚落分布格局，都是构成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王权国家的重要标志。这一切都表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多样化、规范化、秩序化的王朝礼制体系。

二里头王国的礼制成就，首先体现在“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选址制度上。从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中的铭文“宅兹中国”，以及《逸周书》《尚书》《史记》等很多文献记载中可以得知，周灭商之后要在洛阳盆地建立都城，因为这里是“有夏之居”。夏都所在的洛阳盆地就是天下之中，这种观念被周代所继承。所以说，二里头确立了“择天下之中”建都的制度。

此外，在二里头的都城建设中，还体现出“建中立极”的宫廷礼仪。在政治哲学中，“建中立极”指君主通过确立中央权威和最高准则来治理国家。“建中立极”在都城建设中则表现为以宫城为中心，“建中立极”指君主通过确立中央权威和最高准则来治理国家。“建中立极”在都城建设中则表现为以宫城为中心，分布着大中型的宫殿建筑，而宫城之外基本没有大中型的建筑，只有小型的夯土建筑。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建筑都分布在宫城，宫城是当时政治、宗教、祭祀和权力的中心。

多网格式布局的都邑规划

我们在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30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总共发掘了9000多平方米，发现了3条东西向和3条南北向的道路以及道路两边的围墙，从而确定二里头都城被规划成多个方正、规整的功能区，形成“井”字形的多网格式布局。而且，每个网格式区域都有围墙围护起来，以道路相隔。实际上，道路和围墙应该还有更多，但大多数都被破坏了。

少。我们推测当时的车应该只有高等级贵族才能乘坐。

在多网格式布局中，最重要的功能区是祭祀区、宫城、官营作坊区，这三个功能区都处在“井”字形布局的中路。其中宫城处于中心位置，而且宫城的面积最大，环绕宫城的道路也是最宽的。由此看出，宫城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早期的宫殿建筑是多进院落，是牌坊式的宫殿建筑群。以5号宫城和3号宫城为代表，整个夯土台基上有多排房子，但没有一个统一的围墙。到了二里头文化晚期，宫殿建筑格局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四合院式的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以1号宫城建筑群和2号宫城建筑群为代表。1号宫城面积达1万平方米左右，是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最大的宫殿建筑。这些大中型的宫殿建筑是最高等级贵族居住的地方。

在宫城、祭祀区和官营作坊区的左右两侧网格中，发现有贵族居住的高等级房子，同时也出土了陪葬青铜器、玉器的高等级墓葬。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贵族的居住和埋葬区只分布在中心区，即宫城以及周边网格。由此可见，都城总体布局呈现出一种向心分布的特征：宫城在都城最核心的位置，祭祀区、官营作坊区以及贵族居住、埋葬区都环绕着宫城分布。每一个网格可能又属于不同的家族，他们分区而居，从居住上体现出严格的等级。

这种多网格式布局的规划可以说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在二里头之前的良渚、陶寺、石峁、王城岗、瓦店等遗址中，都没有这样严谨规整的多网格式布局。这种多网格式布局的分层分区规划制度，说明当时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王权在管理、统治上是等级分明的，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统治思想和统治制度。我们认为，这是判断二里头已经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的标志。

等级分明的墓葬制度

到目前为止，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400多座墓葬。这些墓葬根据墓坑的大小、随葬品材质的规格高低和数量多少，明显形成了等级差别。像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高等级礼器只见于贵族墓葬中，特别是青铜器的有无、数量的多少成为贵族等级身份的核心标志。其中，青铜酒器显示出突出的地位，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等级分明的礼制。

二里头时代的人流行“居葬合一”的习俗，即居住区与墓葬区在同一地点共存。在宫城牌坊式宫室建筑的院子里，发现有同一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在3号宫城的院子里发现了两排5座贵族墓葬，著名的绿松石龙就出土于3号宫城的院子里，是从最靠近中轴线的3号墓里出土的。

绿松石龙被发现时，位于3号墓墓主人的右臂至腕骨处，无疑是墓主人的珍爱之物。它总长度超过70厘米，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拼成，每片绿松石片都经过加工，厚度在2毫米到9毫米之间，排列紧密。我们推测它当时应该是

粘嵌在一个有机质的底托上做成的。这条绿松石龙的造型非常精美，形象，栩栩如生，被誉为“华夏第一龙”。结合绿松石龙和新砦遗址出土的其他实物，我们推测，二里头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上应该也是一种龙的形象。

在这条绿松石龙的龙身中部，有一个饰有凸纹的铜铃，铃内有玉质铃舌。到现在为止，在二里头遗址一共发现了7件铜铃，每件铜铃都是与不同大小的绿松石龙一起出现的，而且都出于高级别的贵族墓葬中。出土绿松石龙和铜铃的墓葬，一般也都出土了铜爵等青铜酒器，表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比较高的。

龙和铃共同在高等级墓葬中作为随葬品，这是二里头遗址中一种重要的随葬品组合。《诗经》里曾记载，周王祭祀宗庙时，“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龙和铃共同引导灵魂升天，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丧葬礼仪，并且被后世所传承。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石磬、陶埙等乐器，这些乐器是在宫城或宫城周边的贵族居住区、墓葬区里发现的，推测应该是高级贵族专用的。这说明，乐器和礼器一起，已经形成了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青铜礼乐制度。

独特发达的铸铜技术

在宫城的南边有一个专门的官营作坊区，有围墙围护，其中有铸铜作坊、绿松石器制造作坊等。

二里头先民在学习了来自西北的铸铜技术后，结合中原地区发达的制陶技术，创造性地发明并应用了多块陶范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这是中国青铜时代早期最具标志性的技术突破之一。

铸铜作坊里发现有铜器铸区、制作陶范的陶窑，以及陶范、干锅、铜渣、铸铜的工具等各种遗迹和遗物，包括完整的铸铜产业链，说明当时已经有成熟的分工、管理和协作，标志着中国青铜时代技术体系的形成。同时，研究显示，铸铜作坊的铜原料极有可能来自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等冶铜采矿遗址，这些地方距离二里头遗址较远，说明当时的二里头王国对这些重要战略资源及产业链的直接控制和垄断。

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青铜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青铜器。最早出现的青铜器有青铜爵、青铜罍、青铜盃等，其中盃是最核心的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组合明显体现出二里头文化重视酒器的特征，开启了重酒礼制的先河。

有一些贵族墓葬里随葬有漆器和精美的陶器，说明它们也是重要的礼器。

一统中原的统治模式

二里头王国还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核心引领、一统中原的统治模式。

整个二里头文化分布区根据聚落的规模大小、规格高低，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社会结构中，位于金字塔尖的二里头王都规格最高，面积最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二里头都城之下，有次级中心聚落。这些次级中心聚落通常分布在交通要道或重要的战略资源附近，比如铜、绿松石、盐、朱砂等矿源附近。这些次级中心聚落的外围，又有更低一级的聚落拱卫和支撑，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式的聚落分布格局。这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首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中央核心区有一个统一的文明规范的礼制体系，首次开创了一个核心引领、一体化发展、广域王权国家发展的模式，并且一直影响到后世。

研究证明，二里头文化确立的“择天下之中”建都的选址制度，多网格式布局的都城规划，方正规整的宫城建筑以及多进院落、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制度，青铜器铸造技术、青铜礼器的基本组合和形制，尤其是使用青铜礼器的文化制度，完全被商代所继承，并且为商文明奠定了主要的和直接的基础。

二里头文化的礼制体系具有强大的辐射力，对周边很多地区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大甸子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陶爵、陶鬲，苏浙、安徽地区出土了二里头文化的陶觚、青铜罍，四川三星堆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陶器以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铜铃。尤其是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玉质礼器——牙璋有着非常广泛的传播，在湖北、湖南、广东、福建、香港、四川甚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在这些地区并不见二里头风格的陶器，说明可能不是随着人的迁徙传播的，而是这些地区的先民主动学习、接受了牙璋及其所代表的礼制文化。

总之，二里头王国通过制度创新、技术突破和文化传播，推动了中国王朝国家形态的形成，并且为商周文明提供了直接的制度模板和技术基础。所以说，二里头是中国礼制文明兴起的里程碑，更是中国王朝国家形成、礼制社会构建的关键物证。二里头王国的形成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是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根、灵魂和奠基者，为后世中国版图、中国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夏未凉 整理)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新华社发

苏轼与陶渊明

听演讲

以下是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彭玉平近日在“扬州讲坛”上的演讲。

彭玉平

“塵糟陂里陶靖节”

在探讨苏轼的内心世界时，必须追溯其精神源头。苏轼一生成就斐然，被无数后人尊为全民偶像，而他也有自己的精神导师，那便是白居易与陶渊明。白居易所主张的“中隐”哲学——在官场中保持内心出世，深深影响着苏轼。而在灵魂的最深处，陶渊明始终是苏轼渴望触及却难以完全复制的终极理想。

苏轼对陶渊明的推崇绝非停留在文学层面的赏识，而是极度向往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在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后，苏轼面对荒芜的土地，为自己取号，最初萌生的并非世人熟知的“东坡居士”，而是“塵糟陂里陶靖节”。“塵糟陂”是汴京郊外一处杂乱之地，象征着当时困顿的处境；而“陶靖节”就是陶渊明，表明他即便身处低谷也要效仿陶渊明的决心。

化身“宋代陶渊明”

苏轼一生漂泊起伏。因反对王安石变法，36岁的他自请外任，在赴任杭州通判的途中，陈州(今河南淮阳)的田国晨先让他发出了“渊明胡不归”的深沉感慨，隐逸的种子在其心中暗暗生根。

苏轼生命中真正的蜕变发生在黄州时期。真实的“雪堂”绝非后世翻修的琉璃瓦大房，而是苏轼亲手在旧营地搭建的瓦舍矮屋、摇摇欲坠的草屋，门前挂着请人书写的篆书匾额。

在这里，他带领家人深耕细作，妻子养蚕，自己种菜，完全褪去了北宋士大夫的光环，成了一个徒手沾满泥土的农夫。只有当一个切身经历了开垦土地的劳苦，体会到对天对地的期盼，才能真正读懂陶渊明诗中“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忻”的生命悸动。在黄州，苏轼流连于雪堂周遭的山水，仿佛看到了陶渊明笔下那令其流连忘返的“斜川”。他在《江城西》中深情直言：“梦中中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岁月的磨砺让苏轼不再仅仅是历史的旁观者，而是化身为“宋代的陶渊明”。

“和陶诗”的创作

苏轼曾经任扬州知州，正是在扬州短短6个月的任期内，苏轼开启了他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和陶诗”的创作。扬州浓厚的人情味和当时极具特色的“中午饮酒”风俗，赋予了苏轼奇特的生命体验。苏轼的酒量可概括为“小、高、快”——酒量小、兴致高、醉得快。苏轼饮酒不过“五合”(约8两低度果酒)，而对扬州频繁的酒局与繁杂的公务，他常常处于“醉中醒与醒中醉”的微醺状态。正是繁重的行政事务，让苏轼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陶渊明的境遇差异，他无奈地叹息“我不如陶生，世事缠之”。陶渊明可以为了饮酒与自由率性辞官；而苏轼深知自己领着朝廷的俸禄，更有6子嗣需要抚育，无法彻底摆脱名利的羁绊。

因此，苏轼智慧地选择了一条“心醉”之路。在扬州写下的《和陶饮酒二十首》，既是对精神偶像的崇高致敬，也是对自己身不由己的深切释然。既然无法“身隐”，便在内心深处保留一方不受世俗侵扰的净土。

步入晚年，苏轼的政治境遇愈发危险。随着新党再次执政，他接连遭遇重挫，被贬至广东惠州，甚至荒凉的海南儋州。但身体的苦难并未将其击垮，反而促成了他与陶渊明精神的终极合流。

在惠州，清晨听到小儿子苏过诵读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极大地激发了苏轼的情感共鸣。他当即立下宏愿，要将陶渊明的所有存世诗歌全部和写一遍。他的弟子黄庭坚曾这样评价他此时的超然状态：“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流放儋州前夕，苏轼饱受病痛折磨，弟弟苏辙借陶渊明的《止酒》诗苦劝其戒酒保重身体。苏轼意志薄弱，难以真戒，却借机和诗，发出了“若了得此一段，我即渊明，渊明即我”的终极慨叹。

苏轼与陶渊明的同与不同

苏轼虽极度崇拜陶渊明，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独立思考。苏轼并不完全赞同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导致家中幼儿忍饥挨饿的做法。在苏轼的价值体系中，既然选择了职务，便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家庭担当。他自身具备卓越的理解能力与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绝不会任由生活陷入穷困潦倒的绝境。这种轨迹的差异，源于两人对待世俗的不同态度。陶渊明追求的是极端的纯粹，而苏轼则展现出极高的情商与坚不可摧的生命韧性。他深谙顺其自然的生存法则，既无法凭借己之力阻挡时代的风雨，不如调整自己的心境，随遇而安。



绿松石龙形器。视觉中国 供图